



英国宗教 改革研究

蔡骥 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33

蔡骥
著
PDG

98
K561.33
2
✓

英国宗教改革研究

蔡 骐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3 0006 8914 5

英国宗教改革研究

蔡 骥 著

责任编辑:廖志坤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6.75印张 164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81031-597-8/K·034

定价:10.00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英国宗教改革原因探讨	(7)
第一节 宗教改革前的英国:国家	(7)
第二节 宗教改革前的英国:教会	(20)
第三节 异端与人文主义	(35)
第四节 危机与裂痕	(46)
第五节 一种探讨:必然与偶然	(54)
第二章 英国宗教改革历程研究	(62)
第一节 亨利八世: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62)
第二节 爱德华六世:新教的激进	(78)
第三节 玛丽:天主教的反动	(88)
第四节 伊丽莎白一世:国教的完善	(97)
第五节 一种反思:政治与宗教	(111)
第三章 英国宗教改革影响分析	(124)
第一节 政治:都铎革命	(124)
第二节 经济力量的变迁	(136)
第三节 文化与教育:宗教改革的投影	(143)
第四节 宗教改革与社会生活	(154)
第五节 一种透视: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的兴盛	(163)
结语	(172)
注释	(175)
主要参考书目	(191)
后记	(214)

前 言

十五、十六世纪对欧洲来说是一个转折时代,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宗教改革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长期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欧洲宗教改革的研究,但是大多把目光投射到当时德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上,对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理论和实践作了不少探讨和研究,然而对于欧洲其他一些地区,诸如英国、法国以及西北欧的一些国家却没能给以应有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宗教改革这一世界范围的运动的整体理解。本书正是针对这一情况,对英国这一时期在都铎王朝统治下所进行的宗教改革所做的一个个案研究。

英国在宗教改革时期所选择的道路无疑是独特的,它既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加入了反宗教改革的营垒,也不同于德国及瑞士,走上了激进的新教改革之路,而是根据自身的现实状况,选择了一条以折衷和兼容为特点的英国宗教改革之路,产生了国教安立甘宗。这一改革无论是对当时的欧洲态势,还是对英国以后的发展历程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正是我们所有研究宗教史、英国史的学者所不能忽视的。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国内目前尚无专著出版,仅仅在杨真先生的《基督教史纲》(上)、张绥先生的《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以及柴惠庭先生的《英国清教》等书有所涉及,此外还有几篇论文也探讨了这个问题。然而,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从现有成果来看,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是视野的宽度不够,大多数研究者把研究范围局限在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笔者以为亨利八世的改革标志着英国宗教改革的开端,其意义与

地位自然不可忽视,然而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历程,真正英国国教安立甘宗的形成与完善是经爱德华六世与玛丽女王,至伊丽莎白一世时才得以实现,因而只有从整个都铎王朝来考察英国的宗教改革,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英国宗教改革的全貌,才能理解其中的斗争与流变。正确的、宽泛的视野,是我们进行这项研究的必要前提。其次,目前国内对英国宗教改革研究的深度也不够。这种状况首先当然源于前文所提及的对英国宗教改革的重视不够,不明白英国宗教改革之路的独特性及其具有重要意义,这样自然难以产生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再者,也由于受一些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不少史著的描述与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种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政治上的定性代替了实事求是的学术分析,生动丰富的历史被简单化为一些枯燥乏味的概念法则,这种状况使得对该课题的研究已无法深入下去。与国内研究状况相对的是西方学者尤其是英美学者在该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铎史至今依然是英国史研究中的热点之一,这一时期的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得到了系统的整理,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层出不穷,都铎时期作为整个英国史上最吸引人的朝代之一得到了大批史学家的关注,而宗教改革作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事件也同样产生出丰富的研究成果,G·R·埃尔顿、A·G·狄更斯,J·J·斯卡瑞斯布里克等一大批著名史学家在该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切不仅给我们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以启迪与借鉴,也激励我们在这重要领域进行新的开拓。

作为一项对英国宗教改革综合研究,笔者将本书分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部分,即本书的一、二、三章,分别对英国宗教改革的原因、过程及影响进行深入的探讨。笔者以为只有在对以上三个问题有了充分了解后,才可能形成对英国宗教改革正确的认识。当然,这种形式上的划分只是为了论述过程的便利,事实上所有的内容都密切相关。不理解宗教改革的起因,就很难理解它日

后的进程；而对其影响的探讨，更离不开过程这一载体；因而全书只是试图选择不同视角对同一事件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并且我们坚信，就一项科学的历史研究而言，多层面、多方位的探讨是必要的。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笔者详细地探讨了促成英国宗教改革产生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都铎初期国家与教会的现实状况，指出这种政教二元体制及其内在矛盾为日后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前提与土壤。笔者分析了人文主义、异端传统及大陆新教学说对英国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它们与日后英国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力图从英国的历史传统及当时的欧洲国际形势两方面剖析英国宗教改革产生的背景。然后，笔者详尽地考察了作为英国宗教改革导火线的亨利八世离婚案之始末，揭示所有的可能性怎样在合适的条件下转化为现实。最后作为一种探讨，笔者从历史哲学与方法论的高度对英国宗教改革的原因做了一种理论上的综合分析，提出了如何理解其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指出了以往解释模式的不足，并针对这一长期以来引起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确立了新型的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解释模式。

本书的第二章力图对英国宗教改革的历程作一种实证研究。鉴于国内目前关于该事件的资料还比较匮乏，对于其过程的复杂性还存在着不少模糊认识，所以搞清史实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把对英国宗教改革历程的研究上限定为1529年亨利八世改革议会的召开，下限定为1571年《三十九条信纲》的颁布，因为英国主要的宗教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实施的。在实证研究中笔者以英国最权威的教会史文献与都铎王朝宪政文献为基础，参考国内外学者对英国宗教改革研究的丰硕成果，从中梳理出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的脉络，向人们提供这一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并对一些有争议的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力图通过这种对过程的考察，揭示出该时期英国历史的内在走向及其成因，因为这正是历史

所能提供给后人的最有价值的财富。为此,笔者在实证史学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地采纳了心态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宗教学的一些方法,对几代都铎君主的复杂心态作了深入的分析,并选择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从而为这段历史提供一种新的阐释。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第三章深入讨论了英国宗教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影响,这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中最为薄弱的地方。作为一场深刻影响英国历史进程的运动,宗教改革在英国社会的各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政治上的“都铎革命”,经济上的力量变迁,无不对以后的英国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英国的议会、圈地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在宗教改革中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自身,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将大大拓深我们对整个英国史的理解。笔者认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产生往往与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英国史上有着两个著名时代,也许是一种巧合,两者都是女王的统治,即伊丽莎白时代与维多利亚时代。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标志着英国的全盛期,那么熟悉英国史的人都会自然想到工业革命为这一时代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由此我们不禁深思,作为英国史上可以称之为第一个强盛时期的伊丽莎白时代,其繁荣强盛的前提又落在何处?作为最后一个把都铎伟业推向鼎盛的女王,伊丽莎白的成功使人们不能不把目光投射到都铎前几代君主所奠定的基石上,这样一来,英国宗教改革与后期的强盛之间可能有着的某种内在的关联便凸现出来。如果说伊丽莎白时代代表着英国民族国家的兴盛,那么是不是英国宗教改革已经为民族国家的兴盛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于是这条思路成了本书第三章对英国宗教改革影响进行剖析的主线。笔者通过众多方面的具体分析,揭示了该假设是可以成立的,英国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影响,确实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兴盛,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这二者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亲

和性,由此我们对整个都铎史开始有了一种新的整体认识,同时对英国宗教改革的意义的理解也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在此必须说明一点,笔者并不认为自己进行的这种探讨与分析就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模式,因为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进步之中,终极真理往往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若是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这段历史,并且在这种研究中揭示出一些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现象与联系,则笔者的目的也可以算是达到了。

国内史学界传统看法认为,与德国、瑞士的宗教改革相比,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一场保守的改革,笔者对此持有疑义。如果单纯从教义、礼仪与制度等方面去考察,英国确实不如德国、瑞士那样变革得彻底,但仅此就对英国宗教改革作出保守的判断至少不够公允。英国宗教改革产生于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条件,一旦爆发后又深受其历代君主之影响,从而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英国宗教改革之路,并且具备了鲜明的风格与特点。我们评判这场改革的标准应该是这场改革对其民族和国家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教条地去类比于其他国家,国与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又怎能要求它们在相同的领域就一定作出相同的反应?再者,当我们使用“保守”一词时,其中的否定意义只怕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试问对一场改革所下的评判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于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英国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的兴盛之间有着内在关联,这难道是一场“保守”的改革所产生的成果?笔者在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中注意到长期以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英国宗教改革所内蕴的积极意义,它的折衷性与兼容性使英国免去了宗教战争与动乱,给人民带来了安宁与稳定;它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专制王权的发展和英国经济的繁荣,英国很快登上了民族兴盛的顶峰;而宗教改革所隐含的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光芒在以后的历程中将照亮英国人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如果我们承认以上的事实,我们就不该给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简单地扣上一个“保

守”的帽子。倘若一定要对之进行总结的话,笔者更倾向于采用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英国宗教改革走了一条独特的英国式道路,这条道路适合英国的国情,英国宗教改革是一场成功的改革运动。

第一章 英国宗教改革原因探讨

第一节 宗教改革前的英国：国家

宗教改革前的英国处于都铎王朝的统治之下。都铎王朝是由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都铎凭武力所创，他在1485年8月的博斯沃思原野一战中击败了英王理查德三世，从而成为新的国王，即亨利七世。亨利七世的身上有着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四分之一的威尔士血统以及二分之一的英国血统，^①他创业的历程充满了艰辛与传奇色彩。

亨利·都铎是里士满伯爵埃德蒙·都铎与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的独子，幼年在兰开斯特派同约克派的战火硝烟中度过。1456年夏埃德蒙·都铎被约克派掳去并死于卡马森城堡的狱中，身后只留下一个当时年仅13岁的遗孀，她就是亨利七世的非凡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埃德蒙的弟弟彭布罗克伯爵贾斯珀·都铎把玛格丽特带到了彭布罗克城堡，玛格丽特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产下一子以继承亡夫的事业，天从人愿，1457年1月28日她生下了亨利。在以后的岁月中，亨利实现了其母的全部期望。玛格丽特回顾当初时写道：“圣阿格尼丝的那天，我把我善良而优秀的王儿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来”。然而，在当时孤儿寡母却饱受磨难。当亨利年仅4岁时，约克派的爱德华四世夺取了英国王位，彭布罗克城堡也被约克派占领，贾斯珀·都铎逃亡国外，亨利母子被置于新领受了彭布罗克领地的威廉·赫伯特的监护之下。亨利13岁那年，英国局势发生翻转，亨利六世复辟，贾斯珀·都铎也结束亡命归国，他把他的侄儿亨利带到了当时兰开斯特派的朝廷上。亨利六世第一次见到这位来自威尔士的英俊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高度赞扬道：“千真万确，我们以及我们的敌人，双双都得放弃并把天下托付给他”。②这些话日后竟然成了惊人的准确预言。一年后亨利六世失败被处死而断了子嗣，其时，年轻的亨利·都铎成了兰开斯特王朝真正的继承人。爱德华四世于1471年复活节在英国恢复王位后，亨利与其叔感到即使在威尔士也不安全，于是跑到法国西北部独立的布列塔尼公国寻求政治避难，亨利在此度过了他长达十四年的青少年时期。1483年，爱德华四世逝世，登上王位的是一位小王子，不到三个月，爱德华的弟弟格罗切斯特公爵理查德篡位，成为理查德三世。不久，理查德又将爱德华的两个儿子谋害于伦敦塔，这骇人听闻的暴行使他失去了民心，许多约克派贵族也对他抱有敌意。在这种情形下，亨利感到时机已到，提出了对英国王位的要求，并于1483年圣诞节在雷恩大教堂庄严宣誓，一旦他在英格兰登基，就与约克王室的女继承人伊丽莎白公主成婚，他试图以此来取得约克派力量的支持。理查德三世对此立即作出反应，他强烈攻击亨利说：“埃德蒙·都铎和欧文·都铎的后代亨利·都铎无论在父亲还是母亲身上都有私生子的血液，而且野心勃勃，贪欲无度，时刻觊觎着王位，要使国内崇高尊贵的人们永远丧失一切并遭到毁灭性打击。”③可是，人们对这种指责反应非常冷淡。

1485年8月1日，亨利率领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的联合力量以及一支法国军队在阿费勒尔起锚扬帆，越过英吉利海峡，7日在米尔福德港登陆。他亲吻土地，对着自己划了一个十字，然后下令以上帝和圣乔治的名义进军。虽然他只有二千人马，但他充满信心。威尔士人见到本族人有望登上英国王位，纷纷投到亨利的麾下，亨利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五千人，直趋斯塔福特。英王理查德三世在亨利登陆的五天后才得到消息，他立即召集队伍，上前迎击仇敌。8月17日，理查德率军前往莱斯特，他的卫队分成四路纵队前进，两边有骑兵护卫，他本人骑着威武的白马走在中央，全军声势浩大。8月21日，这支大军又开出莱斯特，来到博斯沃思村附近，

第二天双方在此展开决战。从表面上看,形势有利于理查德,他利用国王的权威控制了一万左右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亨利只有五千仓促召集的队伍,但亨利得到了沙场老将牛津公爵的支援,而理查德却遭到了诺森伯兰公爵的背叛,这使得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关于这场战争的具体细节,至今依然是一个谜,史学家们保留着各种各样的记载与描述。基本上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战斗中间,理查德试图通过个人决斗杀死亨利来赢得胜利。他本人带领一队忠实的骑兵冲下山来直取亨利的贴身卫队,他表现出惊人的神勇,杀死了亨利的旗手威廉·布兰登爵士,并且打败了力气过人的约翰·切尼爵士,据说还冲到亨利的身边同他厮杀了一番,后来斯坦利的马队冲过来包围了理查德,而他的马不幸又在这时倒下,他拒绝逃走,于是战死沙场。④这样,8月22日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如今成了新的都铎王朝的诞生之日,而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则将在以后慢慢显现给世人。随后亨利进军伦敦,他于10月的最后一天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八天之后,议会召集会议把他作为从暴君手下拯救黎民的第二位约书亚加以欢迎,并且很快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王位继承权理所应当由亨利及其子嗣世代相传下去。教皇英诺森八世后来还以威胁的口吻宣布,谁要是对于这一合法的王位继承权提出挑战,就把谁革出教门。1486年初,亨利又实现了他酝酿已久的计划,同约克王族女继承人伊丽莎白公主成婚,从而使约克和兰开斯特两派的力量取得了联合,巩固了刚刚诞生的都铎王朝。这一联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内战再起的可能,正如史学家爱德华·霍尔所说:“过去的分裂与争执被埋葬并将永远绝迹”。⑤红白玫瑰的烽火到此告一段落,往日仇杀的双方如今联合在新的都铎旗帜之下。

万事开头难。作为一个新的王朝,都铎统治也有着自身的危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英国人口在十五世纪表现出一种停滞不前的迹象,这又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英国的生育率

较低,另一则是当时家庭对晚婚的提倡,以前英国人往往在十几岁就结婚了,而如今都拖到二十多岁乃至近三十岁才结婚。这样,相对于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以及一些意大利城市,英国从黑死病造成的人口灾难中恢复的进程要显得缓慢,而对于一个前工业社会来说,其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标志往往就是人口的恢复。我们可以看看这样一些数据,在1315—1317年饥谨和1348—1349年黑死病袭击英国之前,英国和威尔士的人口大约在400万到500万之间,也可能高达550万至600万,但到了1377年,人口下降到250万,到了1450年人口更进一步下降到200万,然后稳定在这个水准并逐渐恢复。即使这样,至1525年,不包括威尔士,英国人口仍不超过226万。⑥若是连威尔士在内,宗教改革前人口大约也只有250万。⑦大大低于黑死病以前的水准,而且人口的增长显示出一种不连续性,并局限于某些地区。而在欧洲大陆,1500年法国人口已达到1500万,就是意大利在1550年人口也达到近900万。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巨大的反差。英国人口的减少还产生了一些附带的影响,比如由于缺少佃户,地租开始下降,许多地主不再直接经营自己的土地,而以优厚的条件及低额的地租把土地出租给佃户,并且以往的劳役服务到1500年在英国除了东盎格利亚外已基本消失,货币工资开始增多,而食品价格由于市场需求减少开始下降。其次,从英王的统治来看,由于玫瑰战争所造成的长期动荡与分裂,国王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其地位好象众多的大贵族中的一员,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威与统治力量,有时根本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臣民的利益。因而,如何确立国王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成了亨利七世必须解决的难题。再次,从整个欧洲来考察,英国的岁入比别国少,也没有常备军,仅有一些诸如自耕农卫队的小团体,它们是亨利七世创立的,在达到最高峰的1513也不过600人。⑨与之相较,其邻国法国经过百年战争后力量得到了大大加强,英王在法国的影响已微乎其微,哈布斯堡王朝则一直拥有着神圣罗马帝国

的称号,并通过联姻不断扩张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自身,如何参与欧洲的竞争,如何替自己争取一块生存和发展之地,都还有待于都铎王朝历代君主的努力。

作为都铎王朝的缔造者,亨利七世在其统治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长期以来,经济拮据严重削弱了英王的地位,但此时亨利七世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收复了王室在十五世纪被没收的大部分领地,还收复了其他一些领地。他不仅从兰开斯特家族手中继承了王国的核心地带,还侵占了格洛斯特公爵的北方领地。后来,威廉斯坦利爵士因为对博斯沃思战役的奖赏感到不满发动叛乱而被处决,其在英格兰中部的辽阔领地也落入了亨利的手中。至此,亨利七世有了自己庞大的地产与地产上稳定的收入。兰开斯特派素有不善理财的名声,但亨利七世却是一个例外,他深知开发王国资源,确保收支平衡对于维系王位的重要性,因而十分关心贸易,往往亲自查帐。他对英国与尼德兰的贸易予以特别关注,因为那里的安特卫普港是当时欧洲最大的贸易中心,通过他所签订的一系列商约,英国的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展经济、促进贸易的同时,亨利七世在政治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业绩。他并不推翻原有的制度,但往往对他们作出一些因时因地的改造,以使它们发挥新的作用。在其统治期间,政务会得到了加强。政务会当时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为国王制定政策出谋划策,一是具体管理王国事务,裁决争端。作为王国当时主要的统治机构,政务会的成员由国王亲自挑选,它可以停止英格兰任何一个法庭的活动,将其审理的案子划归自己审理,也可以逮捕任何人并施加严刑。政务会设一个委员会掌管外交事务,另一个委员会掌管财政,财政大臣直接对国王负责,国王是中心人物,体现了直接的个人统治。亨利七世尤其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在对王国的管理上继承了爱德华四世时的一些做法,譬如 1485 年曾经在爱德华四世政务会中任过职的官员有 40 人依然健在,其中有 22 位成了亨利七世的臣子。从 1485 年到

1509年,亨利七世先后召用了227位政务会成员,其中有43位贵族,61位教士,45位廷臣,49位行政官员,27位律师,其成员的组成情况亦与爱德华四世时相仿。^⑩这种政治上的连续性对于维持当时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亨利七世还十分注意选择人才,他经常从布衣中破格录用有才之士,而对于名门望族的子弟反而任用不多。他的大臣几乎都是平民出身,其中许多人是教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法官、温切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在巴黎遇见亨利七世并成为他的患难之交前是赫里福德的一个校长,发明第一部外交密码、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的约翰·斯泰尔早年是一个绸布商。事实上,亨利七世也正是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大大加强了王权。他解散了贵族的私人武装,平毁了城堡,建立皇室法庭惩治不驯顺的贵族。他还颁布法案,宣布所有忠于在位国王的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保护,给大多数国民以一种安全感。在其统治之下,人民从长期的战乱中走了出来,国家出现了稳定与繁荣的迹象。

在外交上亨利七世也同样出手不凡,亨利七世在处理苏格兰问题上显示了他的外交天分。他首先通过支持反对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贵族发动叛乱来削弱詹姆斯四世的地位,但他的目标却不是战争,不久他和詹姆斯四世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和平条约。1502年,他又把女儿嫁给了詹姆斯四世,从而在联合苏格兰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而事实上在其统治期间北方也一直保持着安定。对法国情况则有所不同,亨利七世让议会批准他的对法战争,率军于1492年渡海到达加莱,包围了布伦。法王无力同时对付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于是被迫交纳赎金。西班牙作为当时欧洲新兴的君主制大国,则是亨利七世努力联合的对象。1486年9月,伊丽莎白在英格兰古都温切斯特为亨利七世产下一子,“为纪念不列颠民族”而取名阿瑟。1489年,亨利七世让阿瑟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女儿凯瑟琳订婚,双方结盟。正是通过这些纵横捭阖的权谋,亨利七世使英国在欧洲占据了一个有利

的位置。所有这些内政、外交上的业绩，充分显示了亨利七世的才干，这样，由他首创的都铎王朝君主制成为诺曼征服以来最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由于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一位史学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这是专制的话，那么它是人们甘愿接受的专制”。

⑪

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他的死与其说让国人感到悲伤，倒不如说更让他们有了一种解脱感。毋庸置疑，亨利七世的统治极为有效，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统治也使人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们渴望能够在新国王的手下喘口气。同时，亨利七世长期谨慎的对外政策也使人们感到有些厌倦，他们希望在新一代的领袖率领之下能够去冒险，去征战，重现英国往日对外战争的荣光。继承英国王位的是亨利八世，与严肃乃至有些阴沉的亨利七世相比，他无疑要活泼开朗得多。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着非常好的素养，可以和同时代最杰出的神学家讨论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理论，可以自己谱曲并演唱，在体育运动方面更是有非凡的天赋。总之，多才多艺的亨利八世正是那一时期文艺复兴王子的典型代表。⑫当时各国驻英使节向国内报告他的情况时，均作较高的评价。“亨利陛下是世上最漂亮的君主。他身材高大，小腿匀称，肤色白皙，金棕色的头发照法国人的款式剪短梳直，圆圆的脸庞非常标致，即使扮成女人也是丰姿绰约，脖子又粗又长。……他能讲法语、英语和拉丁语，还能讲一点意大利语；善于吹笛和演奏拨弦古钢琴，能够拿起新的歌谱立即歌唱；拉弓的力气胜过任何一个英格兰人，骑马比枪的武艺也令人叹为观止。”“他喜欢打猎，总是在预定的狩猎路线上布置好备用的马匹，不累垮八到十匹马从不罢休。他酷爱网球运动，看他打球真是莫大快事，白皙的皮肤隔着漂亮的衬衫透出青春的光彩”。⑬在英国许多人把亨利八世作为一种新的希望的象征，希望在他的统治下国家能够进一步发展，“一个新的时代显然正在出现”。⑭